

政治、史學與史家：從〈漢學的陰影〉一文 來看1950~1980年間美國中國共產革命史 研究的轉變*

陳耀煌**

摘 要

沒有一位學者能夠完全不受到外在環境的影響，美國的中國共產革命史研究亦是如此。從 1950 年代的「極權主義典範」，到 60 年代的「自由中派」著作，以至於 70 年代的「革命典範」，在在反映著外在環境與學術的互動關係。新「典範」的興起，必然伴隨著對舊「典範」的口誅筆伐。1980 年前後，又一個美國中國研究圈轉變的關鍵時期，史家馬若孟（Ramon H. Myers）與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發表了〈漢學的陰影〉（“Sinological Shadow: The State of Modern China Studies in the U.S.”）一文，對 1980 年前美國的中國研究，以及學者的政治立場，進行了點名的批

* 本文撰寫與修改期間，承蒙陳永發教授及《政大史粹》審稿人提供許多寶貴意見，在此特別表達謝意。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判，引起其他中國研究學者毀譽不一的回應。本文將以〈漢學的陰影〉一文分析為中心，輔以其他當代美國學者的論述，藉以勾劃出 1950~1980 年代間，美國的中國共產革命史研究的大略輪廓，並進一步探究美國的中國研究與外在環境間的互動關係。

關鍵詞：西方漢學研究、中國共產革命史研究、漢學研究、馬若孟、墨子刻、漢學的陰影

一、前言

1980 年春，美國史家馬若孟 (Ramon H. Myers) 與墨子刻 (Thomas A. Metzger) 發表了〈漢學的陰影〉(“Sinological Shadow: The State of Modern China Studies in the U.S”)一文，¹對 1950~1980 年間，美國的中國研究(包括近現代中國歷史與當代中國的研究)狀況，進行了「點名」的批判。特別是馬、墨二人對美國之中國研究學者曖昧政治立場的批評，被該文的評論者之一伊斯雷爾 (John Israel) 教授認為，〈漢學的陰影〉一文是自 1950 年代初麥卡錫 (McCarthy) 主義與 1960 年代末「關心亞洲學者委員會」(the 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的攻擊中國研究學者的政治立場(詳見後述)後，第三次類似的攻擊。不過，與前兩次近似以「莫須有」罪名進行的政治攻擊不同，〈漢學的陰影〉一文的作者是「知名的學者」。²因

¹ 〈漢學的陰影〉一文，除曾在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3, no.2 (Spring 1980): 98-100 與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4 (Spring 1980): 1-34 發表外，據筆者所知，該文還被收錄於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Chinese Studies*, ed. Amy Auerbacher Wilson (New York: Praeger, 1983) 一書，並曾被翻譯成中文，發表在《食貨月刊》10卷10期(民國70年1月)與10卷11期(民國70年2月)。本文是採用收錄於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Chinese Studies* 一書的版本。

² John Israel, “Introduction”, *Publican China*, vol.9, no.1 (October 1983): 1.



此，吾人便不能僅從政治的角度來批判〈漢學的陰影〉一文，而必須從學術的角度來分析之。

事實上，雖然〈漢學的陰影〉一文，在當時美國的中國研究圈中，曾掀起一陣不小的波瀾。然而，從後來美國的中國研究發展看來，該文似乎並未起任何決定性的重大影響（但不是說毫無影響）；而馬、墨二人在〈漢學的陰影〉一文中所建議的「中國發展典範」（Chinese Development Paradigm），似乎也早已為大多數中國研究學者所遺忘。

儘管如此，筆者個人認為，即使〈漢學的陰影〉對過去美國的中國研究所作的若干批評並不符合事實，但該文仍舊突顯了1980年前後美國中國研究的轉變概況。正如筆者在後文中將指出的，1980年前後可說是美國中國研究圈中的「左」翼觀典（即〈漢學的陰影〉一文中所指的「革命典範」）由盛轉衰的一個關鍵時期。³不少學者在此一時期對「左」翼觀點提出質疑與批評，〈漢學的陰影〉即其中之一。因此，對〈漢學的陰影〉一文的分析，可以使我們清楚的瞭解1980年前後美國中國研究圈中的此一轉變。

然而，由於〈漢學的陰影〉一文所涉及的範圍甚廣，非筆者主觀能力所能處理。因此，在本文中，筆者僅針對該文所突顯的美國中國共產革命史研究（包括1949年後的當代中國研究）發展概況進行處理（事實上，〈漢學的陰影〉一文亦是以此範疇為其主要批評對象）。本文主要的目的在於，以〈漢學的陰影〉一文分析為中心，輔以其他當代美國學者的論述，藉以勾劃出1950~1980年代間，美國的中國共產革命史研究的大略輪廓，並進一步探究美國的中國研究與外在環境間的互動關係。

³ 在這裡必須說明的是，本文為方便論述起見，將美國學者劃分為「左」翼與「右」翼，純粹是指該學者的學術立場而言，與其政治立場無涉。一般說來，「左」翼學者對中共政權多持正面的評價，「右」翼學者則以負面的批評居多。

二、1970年前美國中國共產革命史研究的發展概況

〈漢學的陰影〉一文的批評主要是針對 1950 年以後，逐漸掩蓋過「現代化典範」(modernization paradigm)的「革命典範」(revolution paradigm)而發的。⁴究竟什麼是「現代化典範」？什麼又是「革命典範」？其與美國的中國共產革命史研究又有什麼關係？在本節中，筆者將針對這些問題作一簡單的說明。

大多數史家在論及美國的中國共產革命史研究時，往往會溯及 1950 年以前，一些非專業學術研究者關於其在中國經歷的報導。如斯諾 (Edgar Snow)、泰勒 (George Taylor)，以及白修德 (Theodore White) 與賈安娜 (Annalee Jacoby) 等人的作品，皆可說是膾炙人口的。⁵儘管這些「業餘者」關於中共如何獲得群眾支持多持不同的看法，但大多認為中共所以獲勝，主要是由於廣大人民的支持，蘇聯的援助，只能說是「次要的因素」；而國民黨所以失敗，則是由於其無能及貪污腐敗所致。⁶由於當時外國所能獲得關於中共的資訊相當稀少，因此，儘管這些報導的資料來源及報導者的背景不無可疑，卻成了早期西方人獲得關於中共知識的主要來源。⁷

⁴ Thomas A. Metzger and Ramon H. Myers, "Sinological Shadow: The State of Modern China Studies in the U.S", in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Chinese Studies*, ed. Amy Auerbacher Wilson, Sidney Leonard Greenblatt, and Richard W. Wilson, p.15.

⁵ 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New York: Garden City publishing Co., 1938); George E. Taylor, *The Struggle for North China* (New York: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0); Theodore H. White and Annalee Jacoby, *Thunder out of China* (New York: William Sloane Associates, 1946).

⁶ Kathleen Hartford and Steven M. Goldstein, "Introduction: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Single Sparks*, ed. Kathleen Hartford and Steven M. Goldstein (Armonk, N.Y.: M.E. Sharpe, 1989), pp.4-9. 相關評論可參閱：Mark Selden,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Yenan Way Revisited* (Armonk, N.Y.: M.E. Sharpe, 1995), pp.224-230.

⁷ 大多數1949年前的「非專業」研究者是「新聞工作者」(journalists)，其中如斯諾等人，曾被後來史家懷疑被中共所愚弄。如片崗鐵哉 (Tetsuya Kataoka) 便認為斯諾「並



1949年，由於國際情勢與美國國內恐共浪潮的影響，「第一代」研究者的觀點逐漸為另一種典範所取代，那就是「極權主義典範」(totalitarianism paradigm)。根據學者對蘇聯共黨(以下簡稱蘇共)的研究(即克里姆林宮學)，他們認為共產黨的統治有下列特點：(1)一套官方的、標準的意識型態；(2)一個單一的，由個人所領導的群眾政黨；(3)一套恐怖的警察控制系統；(4)黨控制了群眾的溝通；(5)黨控制了軍隊與武器；(6)黨控制了經濟。⁸由於在1950年代初期，在美國政治界與學術界普遍瀰漫著所謂的「陰謀論」(conspiracy thesis)，認為在世界各地的共黨活動與蘇聯的外交政策不無關係。由此發展，當時的史家認為，中共所以成功，主要是因為蘇聯的援助，而不是其獲得廣大人民支持的緣故；而國民黨所以失敗，也不是因為它的貪污腐敗，而是因為「短視的美國政策制定者受到試圖幫助中共奪權的叛徒影響」所致。⁹在「極權主義典範」學者看來，中共是蘇共的移植，乃典型的極權主義式政黨。這些觀點反映在中國共產革命史研究上，便是特別強調中共與蘇共的關係(將研究重點由抗戰時期轉移

不知道他被中共內部的“毛澤東派”利用來反對其在中國與莫斯科的反對者」。參閱：Tetsuya Kataoka,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p.2.

⁸ 這裡關於共產黨「極權統治」的特點，原是由Carl Friedrich and Zbiniex Brezezinski,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一書所提出，轉引自：Tai-Chün Kuo and Ramon H. Myers, *Understanding Communist China: Communist Chin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8*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ford University, 1986), p.17.

⁹ Kathleen Hartford and Steven M. Goldstein, "Introduction: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Single Sparks*, ed. Kathleen Hartford and Steven M. Goldstein, p.10。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其日後的回憶中也提到，在1950年代初期，「由於受到“共產黨滲入國務院”這件事的策動，越來越多的人接受了這樣的看法：“丟失中國”是由於美國沒有給予國民黨支持而造成的。」參閱：John King Fairbank, *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2), p.335.



到抗戰前的黨史研究）、中共與蘇共意識型態上的傳承（毛主義、列寧主義與斯大林主義間的相似性），以及中共組織特性（藉此突顯中共是由上而下、強迫的動員群眾）的研究。¹⁰

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是「極權主義典範」下的一位著名學者。他除是一位善於馬克斯理論的共產黨員（中國大陸史家說魏特夫後來成爲托派）外，在費正清的回憶中，還是一位「把理論當作終極真理，把抽象當作基本事實」，近似「宗教狂」的學者。¹¹魏特夫於 1957 年出版了《東方專制主義》（*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¹²一書，據費正清所言，魏特夫一貫的看法是，「由於控制水運以行灌溉及內河運輸的要求，因此造成強大中國官僚專制主義的基礎」。¹³不過，在近代以前，中國的士紳階級（雖然本身也是國家的附屬物）仍然能假儒家的道德批判，對國家力量進行某種抵制；自西方入侵以來，傳統體制崩解，士紳階級也逐漸衰亡，「對國家權力進行抵制的最後一種可能手段的消亡，意謂著當一個中央政權伴隨著中共勝利而建立起來後，毛澤東以中國史達林的型態出現就是不可避免的」。¹⁴這樣的一種觀點，在日後中國大陸史家看來，完全是「對馬克斯主義的歪曲」、「對中國歷史的臆造」，是「帝

¹⁰ Kathleen Hartford and Steven M. Goldstein, "Introduction: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Single Sparks*, ed. Kathleen Hartford and Steven M. Goldstein, pp.9-11; Mark Selden,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Yanan Way Revisited*, p.230; Tai-Chün Kuo and Ramon H. Myers, *Understanding Communist China: Communist Chin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8*, pp.17-21.

¹¹ John King Fairbank, *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 p.340.

¹² *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 (New Haven: Yale Univ. Press, 1957).

¹³ John King Fairbank, *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 p.339.

¹⁴ Frederic Wakeman, JR., "Models of Historical Change: The Chinese State and Society, 1839-1989", in *Perspectives on Modern China: Four Anniversaries*, ed. Kenneth Lieberthal, Joyce Kallgren,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Frederic Wakeman, Jr. (Armonk, N.Y.: M.E. Sharpe, 1991), pp.69-70.



國主義冷戰政策的產物」。¹⁵

不過，這樣極「右」的氛圍中，並非完全沒有異議。詹隼（Chalmers Johnson）於1962年所出版的《農民民族主義與共產黨權力》（*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¹⁶一書，用不同的史料（日本的情報資料）證明了第一代史家的觀點——即中共的成功，在於他能夠滿足農民民族主義的需求。¹⁷儘管該書有若干觀點為日後史家所批評，然而，在突破「極權主義典範」的限制上，詹隼確實有其功勞。¹⁸

費正清與他的學生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是另一個例子。費正清並非中共黨史研究的「專家」，但由於他在當時美國中國研究圈中的領導地位，因此，他對於中共的觀點很難說對日後美國中國共產革命史研究的發展，沒有起到任何重大的影響。與1949年前第一代美國中共研究者相同，費正清關於中共的看法，亦多是來自他早年在中國的經歷。在其回憶錄中，費正清便明白的表達了他對中共的立場，即「中共並非莫斯科的傀儡」；

¹⁵ 關於中國大陸史家對魏特夫的批評，可參閱：李祖德、陳啟能編，《評魏特夫的東方專制主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¹⁶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¹⁷ Chalmers Johnson, "Peasant Nationalism Revisited: The Biography of a Book", *The China Quarterly*, no.72 (December 1977): 766-767.

¹⁸ 詹隼在他的著作中便毫不諱言的表達了他對極權主義典範的不滿。他認為，儘管「共產黨“組織的武器”（organizational weapons）是重要的，但它們很難說明共產主義及其他極權主義社會的動力」。參閱：Chalmers Johnson,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 p.11.順便一提的是，「組織的武器」是1950年代初由Philip Selznick, *The Organizational Weapon: A Study of Bolshevik Strategy and Tactics* (New York: McGraw Hill, 1952)一書所提出來的觀點，該書指出列寧主義強調一個有紀律、職業的組織對共產黨奪權的重要性。相關評論可參閱：Kathleen Hartford and Steven M. Goldstein, "Introduction: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Single Sparks*, ed. Kathleen Hartford and Steven M. Goldstein, p.10.



「共產主義在美國是不好的，在中國卻是有益的」。¹⁹但這並不是說費正清認為中共所以成功是因為其馬克思主義意識型態所致，而是因為其土地革命與民族主義的政策，獲得了農民與知識份子的支持。無疑的，這樣的觀點在當時可說是「異常的」(atypical)。²⁰

史華慈對日後美國中共黨史研究發展的影響，可說較費正清大且明顯。在其著作《中國共產主義與毛的興起》(*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²¹一書中，史華慈雖然並未完全背離「極權主義」典範的觀點——強調列寧主義式政黨對中共的影響，但也注意到毛澤東的獨特性。史家費佛(Richard M. Pfeffer)便認為，史華慈的觀點，日後為另二位中共黨史學者施拉姆(Stuart Schram)與麥斯納(Maurice Meisner)所承繼，而成為美國中國研究圈中的一個主流趨勢。²²

在1960年代中期，「極權主義典範」逐漸失去其市場後，以費正清及史華慈為代表的「自由中派」(liberal center)逐漸成為主流。根據趙文詞(Richard Madsen)的說法，「自由中派」的學者並不反對「反共」，只不過他們主張以另一種不同於「冷戰」的手段來「反共」。這些學者認為，中國是一個由極端的空想家所領導的帶有極權主義色彩的革命社會。這個空想家強調階級鬥爭、經濟平等，試圖強加統一的革命價值觀於其人民，並追求一些宏大但卻徒勞的社會試驗(如大躍進)。而這些「革命」手段，與「現代化」是格格不入的。因此，這些「自由中派」的學者認為，只要中國沖淡其革命意識型態，並學習美國經驗，中國也是可以走上現代化道路的。²³

¹⁹ John King Fairbank, *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 p.317.

²⁰ Kathleen Hartford and Steven M. Goldstein, "Introduction: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Single Sparks*, ed. Kathleen Hartford and Steven M. Goldstein, p.12.

²¹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²² Richard M. Pfeffer, "Mao and Marx in the Marxist-Leninist Tradition", *Modern China*, vol.2, no.4 (October 1976): 422.

²³ Richard Madsen, *China and the American Dre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吾人常提及的「現代化典範」，與 60 年代中期「自由中派」的學者便存在著密切的關係。

然而，事實上，所謂的「現代化典範」，雖然常為後代學術評論者提起，但關於其確切定義，以及究竟哪些學者可以被劃歸於此一典範，仍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在這裡，我們主要是採用郭岱君 (Tai-Chün Kuo) 與馬若孟的定義，來探討此一典範在 60 年代美國當代中國研究中的運用。根據郭、馬二人的說法，在 60 年代美國當代中國研究中出現的「現代化典範」，主要有下列幾點特徵：(1)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試圖藉由相互競爭的「轉化性」(transformative) 和「調適性」(accommodative) 政策，以達到現代化的目標；(2) 由於中國的領導者主要採取了「轉化性」政策，因此，中國的經濟常常有劇烈的變動；(3) 中國現代化成果的不穩定，主要是由於中國傳統價值與制度的崩潰，而中共政權又不能發明適當的替代方案所致。²⁴

至於什麼是「轉化性」及「調適性」政策呢？據郭岱君與馬若孟所言，「轉化性」政策是指為達到理想社會的目的所採用的激烈手段，持此一政策的領導者設想群眾能夠接受與過去截然不同的價值，相信群眾能夠藉由不斷的鬥爭以改變自己的信仰，並發明新的組織以使人們的行為更符合這一理想社會；與此相反，「調適性」的領導者認為社會改革應是穩健與逐漸的。明顯的，毛澤東屬於前者，劉少奇則屬於後者。也就是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現代化」成果的不穩固，主要便是毛澤東採用了與過去傳統價值截然不同的激烈手段，其所成立的新制度與價值，造成了中國經濟的大波動，並且也很難作為傳統價值與制度的替代方案，以適應「長期失調」的中國社會。順便一提的是，據郭岱君與馬若孟所言，他們這個說法是受到

1995), pp39-46.

²⁴ Tai-Chün Kuo and Ramon H. Myers, *Understanding Communist China: Communist Chin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8*, p.22.

〈漢學的陰影〉作者之一墨子刻「開創性著作」——《擺脫困境》(*Escape from Predicament*)²⁵一書的啟發。²⁶

關於當代中國研究的「現代化」典範，我們還可以用政治學者白魯恂(Lucian W. Pye)為例。白氏認為，在中國傳統文化之下，中國人形成雙重的政治人格，一是對權威高度依賴的性格，一是尋求紓解的壓抑性格。他認為，毛澤東象徵的那種革命狂熱，一方面滿足了人們對父權的絕對依賴心理，另一方面也宣洩了人們自幼受到父權的壓抑，尋求紓解的沮喪心理。也就是說，中共是依賴毛的領袖魅力來進行威權統治的，它無法建立一個制度化、正規化的國家體制（這是「現代化」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徵）。因此，中共只有找到新的文化價值取代舊的傳統思維，才有可能完成現代化。²⁷

就這樣，1950年代至1960年中期間，美國的中國共產革命史研究，局限在魏特夫等「右」翼學者與費正清及史華慈等「自由中派」學者的爭論上，為其提供主要「論壇」的則是受CIA影響的文化自由會議(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所創辦的《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在這「論壇」上，是不可能看到「左」翼觀點的。²⁸

然而，1960年代中期，情形逐漸改觀。由於越戰所引爆美國國內激進知識份子的反抗運動，以及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出現，「左」翼觀點開始為

²⁵ Thomas A. Metzger, *Escape from Predicame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²⁶ Tai-Chün Kuo and Ramon H. Myers, *Understanding Communist China: Communist Chin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8*, p.22.

²⁷ Lucian W. Pye, *China: An Introduc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2), p.339. 除「雙重性格」外，白魯恂還說中國人有自戀與種族主義的傾向。他的論點，遭到不少西方學者的抨擊。批評者認為白氏對中國人的批評，是來自他個人小時候在中國的經歷（白魯恂曾在中國生活），以及白種人的優越症所致。參閱：石之瑜，〈白魯恂中國觀的評述〉，《美國月刊》第8卷第6期（民國82年6月），頁138-144。

²⁸ Philip C. C. Huang, "Editor's Forward", *Modern China*, vol.2, no.4 (October 1976): 419-420.



美國學者所青睞，逐漸成為美國中國研究圈中的主流典範。²⁹部分「左」翼學者基於學術與政治的目的，組成了若干團體，其中最著名的是「關心亞洲學者委員會」，其刊物是《關心亞洲學者通訊》（*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據趙文詞所言，「關心亞洲學者委員會」的成員是以研究生為主的年輕學者。這些年輕學者對老一輩的學者多有強烈的敵視，這除是由於他們不贊同老一輩研究者的觀點外，還由於當時美國學術體制的緣故。由於美國中國研究才展開不久，能夠擔任研究生導師的教授為數不多——如費正清、鮑大可（Doak Barnett）等人，這些老教授關係密切，除掌握了研究資金的分配外，將來研究生就職也依賴他們的推薦，這就加深了研究生對老教授的依附以及厭惡。越戰爆發後，許多研究生等年輕學者必須上戰場，可能因而戰死，而老教授卻依然留在國內任教，這種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更促成兩代間的衝突。因此，在這些研究生等年輕學者看來，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才真正為被壓迫者承諾了自由，而美國則是一個掛羊頭賣狗肉的自由國家（即諷刺美國學術體制要求研究生對老教授的依附是違背自由）。³⁰

根據趙文詞的說法，這些「左」翼學者視中共為「革命的救世主」（revolutionary redeemer），把中國理想化，以為在中國發生的一切事物都是美好的，甚至把中國當成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及資本主義的被壓迫者的領導者。而文化大革命也被這些學者當成一個創造公正社會的宏偉試驗，它將

²⁹ Tai-Chün Kuo and Ramon H. Myers, *Understanding Communist China: Communist Chin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8*, p.29;

³⁰ Richard Madsen, *China and the American Dream*, pp52-57。根據柯保安（Paul Cohen）的說法，當時流行於美國研究生等年輕學者間自我批評的風潮，與「左」翼的興起亦不無關係。正如費正清所說的，美國人常有一種內疚感，而60年代末「左」翼學者就不幸地染上這種內疚感。參閱：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104-105



消滅不平等，達到一個真正民主的社會，所有的人民都將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團結起來。³¹而據柯保安的說法，這些「左」翼學者猛烈抨擊「現代化典範」，認為該典範是美國的中國研究專家用來為美國戰後在亞洲的政治、軍事、經濟干涉進行辯解的意識型態架構，與「極權主義典範」可說是一丘之貉。³²

在這樣一個混亂的情況下，不少學者開始對過去中共黨史研究進行反思。正如片岡鐵哉在其著作《中國的抗戰與革命》（*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in China*）的自序中所言，他也是 1960 年代末至 1970 年代初感到苦惱的一代。越戰使得當初為美國理想所吸引來的片岡感到相當的震驚，他認為當時的美國，就像二十年前的日本涉入中國事情一般，「似乎將為一個遠方的戰爭摧毀自己」。因此之故，他投入到中國共產革命史的研究中。³³

另一個曾積極投入「關心亞洲學者委員會」的「左」翼學者塞爾登（Mark Selden），³⁴也於 1971 年出版了《革命中國的延安模式》（*The Yanan Way in*

³¹ Richard Madsen, *China and the American Dream*, p52.

³² 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pp.98, 103.

³³ Tetsuya Kataoka,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p.xi。不過，必須說明的是，片岡本人並不屬於「左」翼學者，他的論點與「左」翼強調群眾的觀點也大異其趣。在其著作中，片岡強調共產黨的組織力量，認為中國農民儘管是一股巨大的潛在力量，但其基本趨向是不問政治、一盤散沙、目光狹窄，只有透過中共由上而下的組織，才能將該農民的力量團結起來，以達到各種不同的政策與目標。片岡並不是在當時唯一強調中共組織力量的史家，另一位反「左」翼觀點學者霍夫海因茨（Roy Hofheinz），也頗強調中共組織力量的重要性。關於片岡鐵哉一書的評論，可參閱：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pp.170-171；Yung-fa Chen, *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p.6-8。Hofheinz的著作，請參閱：Roy Hofheinz, Jr., "The Ecology of Chinese Communist Success: Rural Influence Pattern, 1923-45", in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 Action*, ed. A. Doak Barnett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9), pp.3-77。

³⁴ 塞爾登曾是「關心亞洲學者委員會」的參與者之一，參閱：袁易（政治大學國際關係



Revolutionary China)³⁵一書。在30多年後再版該書時，塞爾頓回憶起他當時寫作的動機說：「這本書是喧囂的1960年代的產物。」³⁶作為一位「左」翼學者，一位熱誠的民粹主義者，塞爾登不僅反對史華慈對毛主義的觀點，也反對詹準將中共獲勝僅歸諸於民族主義的因素，而強調中共的民主及社會經濟改革政策。³⁷此一著作的影響是如此之大，以致它日後雖然受到不少史家的質疑與批評，但仍被視為一本開創性的中共黨史經典著作。

在當代中國研究方面，「左」翼研究也有所斬獲，郭岱君與馬若孟將此時主導當代中國研究的典範稱為「革命的社會主義典範」，學者如利皮特（Victor Lipitt）、里斯金（Carl Riskin）皆是此一典範的支持者。這些學者主張：中共領導在毛澤東思想的影響下，制定了為提升全人類福祉為目的的政策；稱讚中國經濟政策（土地革命）所帶來的經濟成長，否認這些政策增加了人民的負擔；認為大躍進及文化大革命的正面影響大於其負面影響等等。³⁸總而言之，在這些學者看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是美國政府應學習、效法的典範。

大體說來，1950~1970年間，美國的中共黨史研究，大體上經歷了「極

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傅禮門—柯林頓政府的中國問題智囊〉，《美國月刊》第9卷第3期（民國83年3月），頁124。

³⁵ Mark Selden, *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³⁶ Mark Selden,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Yen-an Way Revisited*, p.ix.

³⁷ 關於塞爾登一書的評論，可參閱：Yung-fa Chen, *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 pp.4-5; Kathleen Hartford and Steven M. Goldstein, "Introduction: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Single Sparks*, ed. Kathleen Hartford and Steven M. Goldstein, pp.16-17。塞爾登對史華慈的批評，參閱：Mark Selden, "Karl Marx, Mao Ze-dong, and the Dialectics of Socialist Development", *Modern China*, vol.3, no.4 (October 1977): 407.

³⁸ Tai-Chün Kuo and Ramon H. Myers, *Understanding Communist China: Communist Chin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8*, p.29-32.



權主義」、「現代化」與「革命」三個典範。然而，正如大多數學者所指出的，這些典範間儘管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差別，他們其間仍有著若干共同點，其中一個便是以西方的「現代化」為指標來衡量中國。「極權主義典範」視中國為西方現代化的敵人；「現代化典範」則認為只要中國放棄共產主義意識型態，並走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也可以邁向現代化的道路；「革命典範」則認為美國應從中國革命經驗中尋求「進步」的秘訣。³⁹除此之外，三者還存在著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將過去與現在割裂。⁴⁰這正是〈漢學的陰影〉一文抨擊的重點。

三、政治、道德與學術的混淆：〈漢學的陰影〉

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簽署了先前由季辛吉（Henry Kissinger）與周恩來所起草的上海公報，揭開了中美關係⁴¹走向正常化的序幕。1978年12月，在卡特總統任內，中美雙方簽署了意謂著兩國關係正常化正式開展的三項聲明（簡稱〈美中關係正常化文件〉）。在部分美國國會議員（特別是那些與臺灣政府有緊密聯繫，並接受其經濟援助者）看來，如果尼克森的外交舉止是基於國家利益以及策略考量而不得不為之的話，那麼卡特總統與中國的協定就是「不道德」的。這主要是由於尼克森並未因與中國的協議而放棄與臺灣的關係，而卡特卻在1978年12月的聲明中，允諾斷絕與臺灣中華民國政權的外交關係，此無異於「背叛臺灣」。⁴²正如

³⁹ Richard Madsen, *China and the American Dream*, p.102.

⁴⁰ Arif Dirlik, "Reversals, Ironies, Hegemonies", *Modern China*, vol.22, no.3 (July 1996): 256-257.

⁴¹ 在本文中，為方便論述起見，除特別說明外，「中美關係」一詞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的外交關係。

⁴² Richard Madsen, *China and the American Dream*, pp.121-123.茲將〈上海公報〉（1972年2月27日）與〈美中關係正常化文件〉（1978年12月15~16日）有關臺灣部分條文節錄於下，以供讀者比較：〈上海公報〉中美國方面對臺灣問題的聲明：「美國認識到，



墨子刻日後所言，他贊同尼克森基於策略考量而定出的中國政策；至於卡特的中國政策，他則認為是「不道德」與「荒謬」的。⁴³

中美關係逐漸走向正常化，也為自1960年代末以來美國中國研究中的「左」翼觀點起了推波助瀾之助。早在1972年季辛吉秘訪北京前，部分在香港從事學術活動的美國研究生（多是「關心亞洲學者委員會」的參與者），便曾獲准進入中國參觀。儘管這些參觀者的參觀活動受到中國官方的嚴密限制，且其報導在日後學者看來也是荒誕不經的，然而，他們卻成為當時美國學術界的寵兒。這些「朝聖者」的描述，正如何漢理（Harry Harding）日後所言，「幾乎對中國及其人民在共產黨統治下的目標、綱領和成就一片讚美」，⁴⁴無疑增強了美國「左」翼學者對中國的美麗幻想。

1970年代中期後，此一熱潮雖由於「左」翼學術團體「關心亞洲學者委員會」內部分裂（爭奪赴中國代表權）及其對中國「帝國主義」的負面評價，加上部分關於中國負面報導的出現等因素，而有所衰退。⁴⁵然「左」翼的學術觀點仍在美國的中國研究圈中佔有極大的市場。1975年《近代中

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它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關心。考慮到這前景，它確認從臺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在此期間，它將隨著這個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逐步減少它在臺灣的武裝力量和軍事力量。」在〈美中關係正常化文件〉的〈美利堅合眾國關於美利堅合眾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的聲明〉（1978年12月15日）中，美國聲明「自1979年1月1日起，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並於同日，「美利堅合眾國將通知臺灣，結術外交關係，美國和中華民國之間共同防禦條約也將按照條約的規定予以終止」。此外，美國還聲明，「在4個月內從臺灣撤出美方餘留得軍事人員」。以上文件，引自：Harry Harding, *A Fragile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 1972*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2), pp. 376, 379-380.

⁴³ Thomas A. Metzger, "Reply", *Publican China*, vol.9, no.1 (October 1983): 41.

⁴⁴ Harry Harding, *A Fragile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 1972*, pp. 55-56.

⁴⁵ Richard Madsen, *China and the American Dream*, pp. 100-106.



國》(*Modern China*)雜誌的創刊便是最好的例子。正如史家塞爾登所言，《近代中國》是1970年代中美關係逐漸走向正常化的「反射鏡」(reverberation)；⁴⁶史家德里克(Arif Dirlik, 本身也是參與《近代中國》的激進派學者之一)也認為，《近代中國》是學術性較《關心亞洲學者通訊》嚴謹的「革命典範」代表刊物之一。⁴⁷

⁴⁶ Mark Selden, "Karl Marx, Mao Ze-dong, and the Dialectics of Socialist Development", *Modern China*, vol.3, no.4 (October 1977): 407.

⁴⁷ 據德里克所言，《近代中國》的創辦者皆認為有必要重新闡釋「革命」的意義。他們認為中國的革命，並非僅是一個特殊的歷史產物，它與整個第三世界由於資本主義所帶來的階級矛盾而引發的革命在結構上是相同的。而革命的馬克斯主義，是為尋求資本主義替代方案的第三世界馬克斯主義。也就是說，革命並不反對現代性，而是反對帝國主義。參閱：Arif Dirlik, "Reversals, Ironies, Hegemonies", *Modern China*, vol.22, no.3 (July 1996): 257,268-269,281。

關於早期《近代中國》強調中國革命不是特殊的歷史產物，而是第三世界馬克斯主義革命的論點，我們可用1976~1977年間，刊載於《近代中國》中關於「毛主義」性質的論辯文章中看出端倪。此一爭論主要是針對毛主義是否是馬克斯主義的「偏離」而發。其中「左」翼學者費佛等批評「自由中派」學者史華慈、施拉姆，及麥斯納視「毛主義」為馬克斯主義偏離的說法，視馬—列—毛主義的歷史是一段隨著時間與空間而「解體」的歷程，而認為毛主義是「自馬列主義傳統中演化而成的、為達到馬克斯在中國共產主義目標的革命策略」。關於此一論述的文章，請參閱：Richard M. Pfeffer, "Mao and Marx in the Marxist-Leninist Tradition", *Modern China*, vol.2, no.4 (October 1976): pp.421-460; Benjamin I. Schwartz, "The Essence of Marxism Revisited", *Modern China*, vol.2, no.4 (October 1976): 461-472; Andrew G. Walder, "Maxism, Maoism and Social Change", *Modern China*, vol.3, no.1 (January 1977): 101-118; Andrew G. Walder, "Maxism, Maoism and Social Change", *Modern China*, vol.3, no.2 (April 1977): 125-160; Frederic Wakeman, "A Response", *Modern China*, vol.3, no.2 (April 1977): 161-168; Stuart R. Schram,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Pfeffer-Walder 'Revolution' in China Studies", *Modern China*, vol.3, no.2 (April 1977): 169-184; Richard M. Pfeffer, "Mao and Marx", *Modern China*, vol.3, no.4 (October 1977): 379-386; Andrew G. Walder, "A Response", *Modern China*, vol.3, no.4 (October 1977): 387-393; Stuart R. Schram, "Comment", *Modern China*, vol.3, no.4 (October 1977): 367-400; Maurice Meisner, "Mao and Marx in the Scholastic Tradition", *Modern China*, vol.3, no.4 (October 1977): 401-406; Mark Selden, "Karl Marx, Mao Ze-dong, and the Dialectics of Socialist Development", *Modern*



當然，對美國的中國外交政策口誅筆伐的學者，仍大有人在。如同當時部分臺灣人士將此一結果歸咎於美國政府內的親共人士（如費正清）所促成，部分美國學者也持有相同的看法。⁴⁸馬若孟與墨子刻便是持這類觀點的學者之一。

在〈漢學的陰影〉一文中，馬、墨二人開宗明義的即批評道，儘管自1958至1970年間，美國投注了將近四千一百萬美圓於高等教育研究機構，以支持中國研究，但卻未能培養出高水準的學者及可靠的中國專家，以致形成「謬誤的」觀點——「革命典範」，將「北京政府視為歷史的必然，而將臺北政府視為歷史的殘餘」。而此一典範又進一步的影響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中美關係走向正常化很難說與美國的中國研究沒有關係。雖然，臺北政府有能力接受此一「非正常化」的衝擊，但除非美國繼續給予臺北政府強大的軍事支持，否則臺灣很難不會發生危機。因此之故，當務之急便是提出一個「新典範」以取代舊的「革命典範」。⁴⁹

China, vol.3, no.4 (October 1977): 407-417; Edward Friedman, *Marx and Mao and*”, *Modern China*, vol.3, no.4 (October 1977): 419-426; Stephen Andors, “Mao and Marx”, *Modern China*, vol.3, no.4 (October 1977): 427-433; John Bryan Starr, “On Mao’s Self-Image as a Marxist Thinker”, *Modern China*, vol.3, no.4 (October 1977): 435-442; John G. Gurley, “The Symposium Papers”, *Modern China*, vol.3, no.4 (October 1977): 443-464.

順便一提的是，德里克也是著名的美國中國共產革命史專家，曾出版*Revolution and History: 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等著作。

⁴⁸ 雖然費正清對中美關係正常化持積極的立場，然而，根據部分學者的研究，費正清並不認為中美關係正常化，便意味著要把臺灣交給中共。參閱：張朋園，《郭廷以 費正清 韋慕庭：臺灣與美國學術交流個案初探》（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6年），頁79-89。

⁴⁹ Thomas A. Metzger and Ramon H. Myers, “Sinological Shadow: The State of Modern



當然，這並非是說〈漢學的陰影〉是一篇反共的政治宣言，筆者認為，我們應該從嚴肅的學術角度來分析該文。

首先，據馬、墨所言，〈漢學的陰影〉一文所要批評的是過去 20 年來，流行於美國中國研究圈中的「現代化典範」及「革命典範」（後者已在近幾年中壓過前者）。由於美國學者長期受此二典範的影響，故認為中國近代歷史是一段走向「現代化」的歷程；且由於中共以來自西方的馬克斯—毛澤東主義，取代了已死的傳統儒家思想及不合時宜的自由主義價值觀，所以中共 1949 年的勝利是歷史邏輯的必然結果（儘管美國學者一向規避強調歷史必然性的「黑格爾主義」）。⁵⁰

「現代化典範」與「革命典範」，用在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研究上，便會如李文森（Joseph R. Levenson）⁵¹及張灝（Hao Chang）⁵²等人般，主張非放棄中國思想，不能接受西方的價值觀念；也可能如林毓生（Yu-sheng Lin）⁵³般，以為在民國 4~15 年間，中國傳統價值已全面崩潰；或者如麥斯納⁵⁴般，把中國共產主義視為與過去的完全斷絕。這些史家忽視了當代香港新儒家（如唐君毅）、臺灣學者（如王爾敏）、艾愷（Guy S. Alitto）⁵⁵、墨

China Studies in the U.S” , in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Chinese Studies*, ed. Amy Auerbacher Wilson, Sidney Leonard Greenblatt, and Richard W. Wilson, pp.14-15, 41.

⁵⁰ Thomas A. Metzger and Ramon H. Myers, “Sinological Shadow: The State of Modern China Studies in the U.S” , in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Chinese Studies*, ed. Amy Auerbacher Wilson, Sidney Leonard Greenblatt, and Richard W. Wilson, p.16.

⁵¹ 這裡是指 Joseph R.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8-1965) 三卷書。

⁵² 這裡是指 Hao Chang, *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一書。

⁵³ 這裡是指 Yu-sheng Lin,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rth Era*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 一書。

⁵⁴ 這裡是指 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New York: Free Press, 1977) 一書。

⁵⁵ 這裡是指 Guy S. Alitto, *The Last Confucian: 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子刻⁵⁶等人關於傳統與現代及毛澤東主義間的聯繫。總而言之，馬、墨二人認為，「現代化典範」與「革命典範」錯誤的將傳統價值與現代化觀念割裂，忽視了傳統對「現代化」的正面作用。⁵⁷

在社會政治史方面，馬、墨二人認為周錫瑞（Joseph A. Esherick）⁵⁸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分析辛亥革命時，錯誤的以為由於保守的「城市改革派菁英份子」的阻擾，導致該革命越來越與「革命份子」及「群眾」脫離；批評費維愷（Albert Feuerwerker）⁵⁹認為現代工業無法在清末急速發展，傳統價值對此應負大部分責任；責難易勞逸（Lloyd E. Eastman）⁶⁰及塞爾登⁶¹等人，把國民黨的失敗歸咎於其價值觀的落後，把共產黨的成功歸咎於共產主義價值觀的優越。而這些人的錯誤，也大多是由於他們遵循了「現代化典範」與「革命典範」，把傳統與現代割裂、對立的緣故。⁶²

在經濟史方面，馬、墨二人根據墨菲（Rhoads Murphey）⁶³與馬若孟⁶⁴等

Modern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一書。

⁵⁶ 這裡是指Thomas A. Metzger, *Escape from predicament: Neo-Confucianism and China's Evolving Political Culture*一書。

⁵⁷ Thomas A. Metzger and Ramon H. Myers, "Sinological Shadow: The State of Modern China Studies in the U.S", in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Chinese Studies*, ed. Amy Auerbacher Wilson, Sidney Leonard Greenblatt, and Richard W. Wilson, pp.16-20.

⁵⁸ 這裡是指Joseph A. Esherick,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一書。

⁵⁹ 這裡是指Albert Feuerwerker, *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Sheng Hsuan-huai (1844-1916) and Mandarin Enterpris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一書。

⁶⁰ 這裡是指Lloyd E. Eastman, *The Abortive Revolution: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 1927-193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一書。

⁶¹ 這裡是指Mark Selden, *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一書。

⁶² Thomas A. Metzger and Ramon H. Myers, "Sinological Shadow: The State of Modern China Studies in the U.S", in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Chinese Studies*, ed. Amy Auerbacher Wilson, Sidney Leonard Greenblatt, and Richard W. Wilson, pp.16, 20-25.

⁶³ 這裡是指Rhoads Murphey, *The Outsiders: The Western Experience in India and China*



人的研究，認為「在西方人請求中國原諒前，他們應該記住，帝國主義既未造成也未加劇中國 20 世紀的經濟困境；而這樣的困境，除由於日本的侵略外，大部分應歸咎於如伊懋可（Mark Elvin）所描述的中國長期的經濟與人口演變結果」。批評「現代化典範」與「革命典範」將近現代中國的困境歸因於如費正清所強調的帝國主義侵略；或是採取古典經濟主義的說法，如伊羅生（Harrold R. Issacs）⁶⁵、畢仰高（Lucian Bianco）⁶⁶等人的主張，將其歸因於地主、商人的經濟剝削；甚至採用格申克龍（Alexander Gershenkron）⁶⁷的說法，主張在經濟落後的國家，經濟成長愈需依賴巨大的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7)一書。

⁶⁴ 這裡是指Ramon H. Myers, *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opei and Shantung, 1890-1949*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等著作。

⁶⁵ Harold R. Isaacs,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與魏特夫相同，伊羅生也被認為是一位「托派」史家。其著作主要闡明中共在1927年所以遭受災難，是由於斯大林採取玩世不恭的態度，不惜犧牲中國革命以配合他反托洛茨基的政治需要所造成的。相關評論可參閱：John King Fairbank, *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 pp.78-84.

⁶⁶ Lucian Bianco, *Origi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5-1949*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畢仰高是法國中共黨史史家。筆者認為，畢仰高教授在中共黨史研究上的貢獻，並非如馬、墨二人所言，採用古典主義的說法，強調地主、商人的剝削；而是在於強調農民傳統自發性暴動的保守性，及其與中共意識型態及組織的差異和可能發生的衝突。參閱：Lucian Bianco, *Peasant without the Party* (Armonk, N.Y.: M.E. Sharpe, 2001).

⁶⁷ 關於格申克龍這位經濟史家，對於中國史研究者來說可能較為陌生，在此特做一簡單介紹。格申克龍在1962年出版了《從歷史觀點看經濟落後》（*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一書，反對另一位經濟史家羅斯托（W. W. Rostow）在《經濟增長的階段：一篇非共產黨的宣言》（*The Stage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一書中所提出來的論點。羅斯托以英國工業革命經驗為基礎，假定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過程有一「普遍性」的模式——「準備階段」、「起飛階段」與「持續增長階段」；相反的，格申克龍在其著作中以俄國為例，強調歐洲大陸國家的經濟發展與英國的經驗迥然不同，主張「落後」國家（如俄國）在實行工業化時，其特徵是政府角色的加強。相關評論可參閱：郭少棠，《西方的巨變（1800~1980）》（臺北：書林出版又限公司，民國83年），頁35-42。



政府干預，因此主張經濟剩餘只有在社會主義之下，才能合理運用。而忘記了中國近現代知識份子對西方帝國主義正面的評價，以及如臺灣學者王爾敏教授所陳述的，中國知識份子在帝國主義極盛時，仍持有極樂觀的世界觀。⁶⁸

關於當代中國研究，馬、墨認為當代中國學者僅注意到毛澤東思想與歐洲馬克斯主義的關係，並因此強調其「轉化性政策」對中國現代化的貢獻。其中如利皮特⁶⁹、安德斯（Stephen Andors）⁷⁰強調「轉化性政策」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正面影響；白魯恂⁷¹及其學生所羅門（Richard H. Solomon）⁷²雖然注意到傳統中國人格中的「依賴性」，但卻將此傳統視為與現代化相互衝突等等。⁷³與此相反，馬、墨認為，傳統中國人的「依賴性」，有助於建立一種現代化倫理的責認感所需要的動機（如墨子刻所言）；而中國的

⁶⁸ Thomas A. Metzger and Ramon H. Myers, "Sinological Shadow: The State of Modern China Studies in the U.S", in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Chinese Studies*, ed. Amy Auerbacher Wilson, Sidney Leonard Greenblatt, and Richard W. Wilson, pp.25-27.

⁶⁹ 這裡是指 Victor Lippit, *Land Refor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A Stud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 Finance* (White Plains, N.Y.: 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 1974)一書。

⁷⁰ 這裡是指 Stephen Andors, *China's Industrial Revolution: Politics,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1949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7)一書。

⁷¹ 這裡是指 Lucian W. Pye,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A Psychocultural Study of the Authority Crisi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68)一書。

⁷² 這裡是指 Richard H. Solomon, *Mao's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一書。

⁷³ 前面曾提到白魯恂的雙重性格論，以及中國人有自戀與種族主義傾向的論點。他的學生所羅門則進一步提出所謂的「伊底帕斯情結」，認為由於溺愛幼子的緣故，造成中國人自幼就有相當的自戀傾向。當自戀傾向的幼兒在成長時碰到極度權威的父親，勢必造成沮喪。因此，自戀傾向與父權至上的文化，創造了中國人又要反權威，又要依賴權威的特殊性格。中國人要靠著反權威才能滿足自戀情結；但中國人也必須靠著萬能的父權，才能求取心理上的安定。參閱：石之瑜，〈白魯恂中國觀的評述〉，《美國月刊》第8卷第6期（民國82年6月），頁140-141。



經濟事實上並未因毛澤東「轉化性政策」而獲得巨大發展，相反的，由於中共政權摒棄了傳統的農村組織，不能善加利用中國在 20 世紀 30 與 50 年代所發展的技術，因此未能獲得經濟發展上的重要突破。總而言之，馬、墨認為美國的中國研究由於強調毛主義與歐洲馬克斯主義的關聯，因此對當代中國大陸政權多持正面的評價，而忽略了其「倒退」的一面。⁷⁴

關於對近現代中國史研究影響頗大的施堅雅 (G. William Skinner) 及其「中心地 (central places) 理論」，馬、墨二人也頗多責難。簡單的說，馬、墨認為施堅雅的理论不僅與事實不符，且印證了美國的中國研究學者並未曾對中國傳統組織，及其在現代化過程中的影響，持有一較持衡的看法。⁷⁵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了解，〈漢學的陰影〉一文的主旨，在於批評流行於美國中國研究圈中的「現代化典範」及「革命典範」。這兩個典範對中國傳統多持負面的看法，並將中國傳統與現代化相對立，忽略了中國傳統對推進中國現代化的正面作用。因此之故，美國的漢學家對中國共產革命多持正面的評價；對於承繼、發揚中國傳統文化，並因而創造經濟奇蹟的臺北政權，則多抱持負面的批評。如此便影響美國政府制定了錯誤的外交政策。

因此之故，馬、墨主張將中國歷史系統地放入近幾個世紀來中國文化與社會演化的脈絡中進行考察。⁷⁶馬、墨認為，無論是「轉化性政策」或「調適性政策」，都有其傳統的淵源。中國傳統政府在制定「轉化性政策」或

⁷⁴ Thomas A. Metzger and Ramon H. Myers, "Sinological Shadow: The State of Modern China Studies in the U.S", in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Chinese Studies*, ed. Amy Auerbacher Wilson, Sidney Leonard Greenblatt, and Richard W. Wilson, pp.27-33.

⁷⁵ Thomas A. Metzger and Ramon H. Myers, "Sinological Shadow: The State of Modern China Studies in the U.S", in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Chinese Studies*, ed. Amy Auerbacher Wilson, Sidney Leonard Greenblatt, and Richard W. Wilson, pp.33-37.

⁷⁶ Thomas A. Metzger and Ramon H. Myers, "Comments by the Authors Regarding 'Sinological Shadows'", in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Chinese Studies*, ed. Amy Auerbacher Wilson, Sidney Leonard Greenblatt, and Richard W. Wilson, p.47.



「調適性政策」時，皆必須與知識階層（菁英份子）討論，以獲得其支持（如未能獲得支持，可能發生傳統性的「領袖危機」）。一般說來，一旦危機解除，傳統政府會採取「調適性政策」，並因此獲得巨大發展，1500~1800年間中國財政經濟的成長即是一個例子。除此之外，社會變遷亦受到歷史「偶發」因素的影響。這種強調傳統組織習慣、政治文化、領袖與知識階層關係，及偶發因素的作用，即所謂「中國發展典範」。⁷⁷

由此觀之，中國現代史上的持續分裂，即是由於領導者與菁英份子不能就「轉化性政策」或「調適性政策」取得一致而產生領導危機，加上日本侵略的「偶發」因素，最終造成國民黨的失敗及共產黨的獲勝。在1949年後，臺海兩岸政權的「領袖危機」皆較前解除。然而，中共政權採取了「轉化性政策」，而臺北政府採取了「調適性政策」。因此，臺灣獲得了較成功的經濟發展。⁷⁸由此，我們也可看出，馬、墨二人在政治立場上較傾向緩和的「調適性政策」，而非激進的「轉化性政策」。

四、對〈漢學的陰影〉一文的批評

關於〈漢學的陰影〉一文在美國中國研究圈中引起了多大的回響，由於資料所限，筆者無從得知。在這裡，筆者僅能就1983年3月在San Francisco所召開的一場學術研討會，針對〈漢學的陰影〉一文所提出的批評進行分析。

首先提出批評的是柯保安教授。柯氏提出了3點批評：

⁷⁷ Thomas A. Metzger and Ramon H. Myers, "Sinological Shadow: The State of Modern China Studies in the U.S", in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Chinese Studies*, ed. Amy Auerbacher Wilson, Sidney Leonard Greenblatt, and Richard W. Wilson, pp.37-39.

⁷⁸ Thomas A. Metzger and Ramon H. Myers, "Sinological Shadow: The State of Modern China Studies in the U.S", in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Chinese Studies*, ed. Amy Auerbacher Wilson, Sidney Leonard Greenblatt, and Richard W. Wilson, pp.39-41.



(1) 在〈漢學的陰影〉一文中，馬、墨二人不僅常常簡化了某人的著作以支持其論點（如林毓生的例子）。且被其指為代表「革命典範」的著作，不少是二、三十年前的著作；而被用來證明其論點的著作，有的則是近幾年內的著作。因此，不能說「革命典範」是近年來流行於美國中國研究圈中的趨勢。⁷⁹

(2) 柯保安質疑，既然「中國發展典範」強調傳統的力量，何以又說「帝國主義有責任把經濟成長與各種進步的可能性介紹給中國」，這不是自相矛盾嗎？而事實上，早在 1970 年代後便有史家提出「修正的現代化典範」，如魯道夫（Lloyd I. Rudolph）所謂「傳統社會中的現代化潛力」⁸⁰，與馬、墨的「中國發展典範」如出一轍；更何況所謂的「中國發展典範」，也是把中國歷史發展設想朝向一特定方向（即現代化）前進，這與過去「現代化典範」等宏觀典範（grand paradigm），有什麼差別呢？⁸¹

(3) 如果所謂「革命典範」並未如馬、墨所言，是近年來美國中國研究圈中的主流趨勢，如此便不能說美國近來的外交政策是受到中國研究學者的影響；更何況有辦法讓華盛頓政治家洗耳恭聽的中國研究學者，並不是被馬、墨指為「革命典範」的學者——如塞爾頓、周錫瑞，或麥斯納，而是被馬、墨當成「現代化典範」的代表人物——如費正清、白魯恂、所羅門、珀金斯（Dwight Perkins）。最後，柯氏認為，真正影響美國外交決策的是美國戰略思考及政黨選舉策略，並不是中國研究學者；因此，就算如馬、墨所說的「在美國知識份子間，反共在基本上被普遍地認知」屬實，

⁷⁹ Paul A. Cohen, "Sinological Shadowboxing: Myres and Metzger on the State of Modern China Studies", *Publican China*, vol.9, no.1 (October 1983): 6-7.

⁸⁰ Lloyd I. Rudolph and Susanne Hoeber Rudolph, *The Modernity of Tradition: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Indi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2). 對此書的介紹與評論，可參閱：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pp.80-82.

⁸¹ Paul A. Cohen, "Sinological Shadowboxing: Myres and Metzger on the State of Modern China Studies", *Publican China*, vol.9, no.1 (October 1983): 7-8.



恐怕也不能改變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進展。⁸²

第二位進行評論的是麥斯特（Herman Mast）教授。麥氏的評論主要是從方法論出發。他批評馬、墨的邏輯情感成份居多，他們的許多論點是一般常識所謂的「胡扯」（poppycock）。針對馬、墨對周錫瑞的批評，麥氏贊同馬、墨宏觀層次（macro level）的批評（即認為辛亥革命並非一不能逆轉的革命潮流的展現），以及微觀層次（micro level）的批評（即認為改革者的現代化不見得會加深人民的困境）；然而，麥斯特認為，周錫瑞的著作並不屬於宏觀及微觀層次的分析，而是屬於第三（中間）層次的分析，是運用馬克斯主義理論所作關於導致革命先決條件的「積累因素分析」（cumulatively casual analysis）。⁸³

根據社會學家史汀區康（Arthur Stinchcombe）的說法，「積累因素」的總合會促成永久的社會系統本質轉變。強調歷史變遷的「積累因素」，即是反對某些歷史家將歷史變遷的因素歸因於某一大事件。根據托洛茨基的研究，我們可以在俄國1917年革命中發現兩種「積累因素」：第一，由於俄國「漸增」的加入國際資本主義體系所引發的社會緊張，而革命前的政府缺乏處理此一危機能力；第二，在一般環境下階級意識薄弱的工人階級，經過革命的學習，鍛練了其階級意識，由此產生了知道要做什麼的強壯政黨。也就是說，革命本身是階級形成、劃清階級界，以及加強階級敵視的熔爐（furnace）。⁸⁴

讓我們再回到麥斯特的評論。據麥斯特的說法，周錫瑞是「階級薄弱」與「革命坩堝（crucible）」假設最好的運用例子。一方面，麥斯特反對馬、

⁸² Paul A. Cohen, "Sinological Shadowboxing: Myres and Metzger on the State of Modern China Studies", *Publican China*, vol.9, no.1 (October 1983): 9-10.

⁸³ Herman Mast, III, "Rethinking the Myers/Metzger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ethod" *Publican China*, vol.9, no.1 (October 1983): 12-14.

⁸⁴ Arthur L. Stinchcombe, *Theoretical Methods in Social Histo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8), pp.61-70.



墨所謂階級分析不適用中國，而認為此一假設是一般常識，在其他地區也可發現類似的例子。另一方面，麥斯特認為，此一假設只是假設，必須要不斷的以事實來驗證。因此，此一假設只能說是「一般概念」(general concept)，而不是「時代概念」(epochal concept)，馬、墨所說的把革命視為邏輯必然的「革命典範」是屬於後者。⁸⁵

第三位對〈漢學的陰影〉一文提出批評的是傅禮門(Edward Friedman)教授。傅氏是哈佛大學出身，1964年來臺灣，一邊在臺灣大學旁聽中國現代史，一邊在中國國民黨黨史會搜集資料，撰寫博士論文；1968年，以〈回到革命〉(*Backward Toward Revoluti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Party*，指導教授為史華慈，1974年出版)一文獲得博士學位。如前所述，傅禮門與塞爾頓是「關心亞洲學者委員會」的參與者之一，兩者皆是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左」翼學者。⁸⁶對於一位「左」翼學者來說，〈漢學的陰影〉一文無疑是相當刺耳的，因此，傅禮門對該文的批評也特別激烈。關於傅禮門的批評，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點來說明：

(1) 首先，傅氏責難馬、墨對其他中國研究學者的「咒罵」(vituperation)，威脅到美國中國研究學術圈同僚間的情誼；認為馬、墨模仿賴斯(Simon Leys)的《中國的陰影》(*Chinese Shadow*)一書⁸⁷，「抹黑」(denigrate)美國的中國研究學者，儘管馬、墨二人並未如賴斯般，偏好採用一些「辱罵」(abusive)的字眼。此外，傅禮門還批評馬、墨對費

⁸⁵ Herman Mast, III, "Rethinking the Myers/Metzger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ethod" *Publican China*, vol.9, no.1 (October 1983): 12-14.

⁸⁶ 傅禮門後來成為柯林頓政府的中國問題智囊團的一員。關於傅禮門的經歷，可參閱：袁易(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傅禮門—柯林頓政府的中國問題智囊〉，《美國月刊》第9卷第3期(民國83年3月)，頁123-126。

⁸⁷ 賴斯在其書中諷刺費正清、斯諾，與韓素音三人在*Foreign Affairs*, vol.15, no.1 (October, 1972)中發表的"The New China and the American Connection"一文，既諷刺，又天真，且太多外交詞令。參閱：Simon Leys, *Chinese Shadow*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Ltd., 1978), pp.213-214.



佛、安德斯，及塞爾（Charles Cell）等「左」翼學者的攻擊只是「打落水狗」，因為這些學者當時早已由於其政治立場而不受美國學術機構聘請（其中一位的離職還被當成「擺脫了共產黨」而被刊登在雜誌上慶祝）。不過，傅禮門也感嘆馬、墨並不是在1980年代前後，對過去中國研究提出批評的唯一學者。因此，正如該文題目的標題，傅禮門自詡其目的是提高同僚間的情誼，反擊這些「咒罵」的毒害。⁸⁸

（2）就學術上的批評來說，傅禮門責難道，當馬、墨批評其他學者簡單化與矛盾，為什麼不想一想自己也犯了同樣的錯誤呢？如在《擺脫困境》一書中，墨子刻不也是稱讚毛主義嗎？而墨子刻後來也對自己的觀點提出批評，這不也是說明了學者皆可能由於資料的不足而犯錯嗎？⁸⁹

至於說過去中國研究學者所以贊同共產革命是因為他們認為中國共產主義是「外來的」，而非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這也不是事實。以費正清為例，他認為「中國共產黨的勝利，……並非由於來自蘇聯的援助，而是因為他們有效的利用了社會革命的力量，特別是民族主義及農民生計方面」。傅禮門認為，把中國共產革命的勝利歸因於「外來的」因素，是一個世代以前麥卡錫時代學者的說法（即諷刺馬、墨是這些學者「意識型態的同盟者」），而費正清等人所反對的正是這種說法。⁹⁰

（3）最後，針對中美臺關係，傅禮門認為，馬、墨的指控就如同50年代將華盛頓視為蔣介石政權在大陸失敗的代罪羔羊的觀點一般。〈漢學的

⁸⁸ Edward Friedman, "Collegiality and China Study", *Publican China*, vol.9, no.1 (October 1983): 17-18, 21-22.

⁸⁹ 明顯的，傅禮門對墨子刻尤其不滿，這可能是因為墨氏曾在 "Sinological Neurosis: A Postscript to 'Sinological Shadows'" 一文中猛烈的批評 John King Fairbank。遺憾的是，筆者並未能尋獲此份資料。Edward Friedman, "Collegiality and China Study", *Publican China*, vol.9, no.1 (October 1983): 19-20.

⁹⁰ Edward Friedman, "Collegiality and China Study", *Publican China*, vol.9, no.1 (October 1983): 22-23.



陰影〉一文認為「如果」不是領導人的錯誤，以及日本陷入共產黨統一戰線的陷阱⁹¹等「偶然」因素，國民黨可能不會失去大陸，且會為中國大陸帶來繁榮與現代化（證諸後來的臺灣經驗）；傅禮門認為，馬、墨二人忽略了1927~1949年間發生在中國的許多史實，例如：為什麼許多父母自願要其子女參與紅軍？是什麼樣的貪污、不公正，導致紅軍戰勝了裝備居於優勢的國民黨軍隊？⁹²

如此說來，把蔣介石政權的失敗歸因於美國，並不完全是事實。把臺灣在1970年代的外交失敗，歸因於美國的中國研究學者，也不完全正確。傅禮門認為，對美國對中國外交策略有影響的並不是馬、墨攻擊的費正清，而是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鮑大可（提出「圍堵而不孤立」的政策）⁹³等人，這些人馬、墨並未提到。更何況，即使是臺灣的某些政治人物亦認為，要為臺灣過去外交失敗負責的，是國民黨政權內某些大權在

⁹¹ 史家片崗鐵哉認為中日戰爭的爆發，是一件偶然的事件，而不是預先策劃的結果。因此，不能單方面從日本的行動來解釋中日戰爭的爆發，中共的統戰謀略也難辭其咎（片崗認為在蘆溝橋開槍射擊日本軍的可能是中共或不滿的傀儡政權官員）。參閱：Tetsuya Kataoka,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pp.48-52。馬、墨二人採信了此一說法，不過傅禮門認為這是「作賊的喊捉賊」（blaming the victim for the crime）的觀點。

⁹² Edward Friedman, "Collegiality and China Study", *Publican China*, vol.9, no.1 (October 1983): 24.

⁹³ 鮑大可於1921年出生於上海，父親是傳教士，童年在中國長大，後畢業於耶魯大學。1970年代中美關係逐漸走向正常化時，鮑大可任職於布魯金斯研究所（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該所為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學術機構之一，專門研究及分析美國內政及外交重大問題，鮑氏因此與美國政府關係密切。出於「地緣政治」的考量，鮑大可於1966年提出「圍堵而不孤立」的政策。他認為除非美國與中共建交，亞洲的權力平衡便無法維持。因此，鮑大可力主美國應放棄支持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並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他認為，中共以武力取臺的可能性很小，且廢除中（指中華民國）美共同防禦條約並不代表放棄中華民國。所以，為了與中共建交之故，鮑大可主張美國應接受中共所提建交的條件：即與中華民國斷交、廢止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以及自臺灣撤軍。參閱：關中，〈書評：鮑大可著「美國對華政策—舊問題與新挑戰」評介〉，《中華學報》第4卷第2期（民國66年7月），頁203-215。



握的極端保守官僚，馬、墨二人對於這些卻完全不了解。⁹⁴

最後，傅禮門認為，把「臺灣奇蹟」完全歸因於臺灣承繼了中國文化傳統的說法，也不完全是事實。據傅氏所言，日本人的遺產以及美國的援助等因素，也是臺灣創造經濟奇蹟不可獲缺的因素之一。此外，傅禮門也說道，國民黨政權內部的「保守死硬派」，直到1980年代初還在捕殺「民主人士」。如此說來，馬、墨所稱讚的臺灣民主，恐怕還有一段艱辛的道路要走。⁹⁵

以上是柯保安、麥斯特，以及傅禮門三位教授對〈漢學的陰影〉一文所作的批評，接下來讓我們來看馬若孟與墨子刻的回應。

首先是馬若孟的回應。針對柯保安的批評，馬若孟辯稱，〈漢學的陰影〉雖有其政治的用意，但其主要動機是學術的；所謂革命的典範，他們主要指的是流行於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間的學術典範，並不是說該典範在「近年來」流行於美國中國研究圈；說他們誤將某一學者歸類於某一「典範」，馬若孟則辯稱，他們所以這樣做，並不是要「抹黑」該學者，而是為了說明「這些不同的著作如何促成一個為各中國研究學者所同意且分享的知識體系的出現」；至於說〈漢學的陰影〉所提出的「中國發展典範」早在1970年便已有人提出類似的說法，馬若孟則說，他們從沒有說過該「典範」是近年來才出現的趨勢；就學者與政治界的關係，馬若孟並不贊同柯保安的說法，而認為學術風氣確實對國家政策的制定造成某種程度的影響。針對麥斯特教授的批評，馬若孟只是簡單的說，他們對周錫瑞不僅有負面的批評，也有正面的稱讚；至於說「中國發展典範」也可能成爲一個有缺點的典範，馬若孟並不表示反對，且認為今天對中國歷史的解釋與明

⁹⁴ Edward Friedman, "Collegiality and China Study", *Publican China*, vol.9, no.1 (October 1983): 18-23.

⁹⁵ Edward Friedman, "Collegiality and China Study", *Publican China*, vol.9, no.1 (October 1983): 24-25.



天的解釋，必然是有所差異的。針對傅禮門的批評，馬若孟則不無諷刺的說，善於使用「辱罵」等字眼的不只有他們而已，傅禮門也稱得上是個中翹楚；關於傅禮門對墨子刻的批評，馬若孟則認為傅禮門完全誤解了墨子刻的說法，因此，傅禮門的批評不值一評；至於說〈漢學的陰影〉忽略了導致 1949 年國民黨政權失敗的若干因素，馬若孟則說他們只是試圖提出不同於過去「革命典範」與「現代化典範」的解釋，而他們所提出的解釋，馬若孟相信，將會為新一代的學者所證明。⁹⁶

最後，馬若孟總結的說，首先，他不敢相信上述三位評論者曲解及損害了〈漢學的陰影〉一文的分析架構；其次，更重要的是，馬若孟認為，上述三位評論者皆接受了「革命典範」的解釋，且他們含蓄的主張該典範要廣泛的為學者所接受。⁹⁷

接下來是墨子刻的回應。首先，墨子刻說道，大部分傅禮門教授的評論，特別是他將〈漢學的陰影〉一文與麥卡錫主義聯繫起來，以及他指桑罵槐說馬、墨與某些馬克思主義學者的失業有關等說法，是不值一評的。至於那些針對〈漢學的陰影〉一文的政治色彩所提出的批評，墨子刻承認，在中國研究中很難避免政治判斷。雖然〈漢學的陰影〉一文有政治判斷，但它不像費正清一般，有意無意的以學術分析來掩飾其政治判斷；相反的，它是明確的表明其政治判斷，而這是邁向學術誠實的道路。因此，重要的不是在於能否避免政治判斷，而在於能否將偏見減至最低。墨子刻堅稱，〈漢學的陰影〉一文完全不受到「親毛」及「反中華民國」偏見所影響的。而在太平洋兩岸（指美國及臺灣）的知識份子所以有這種偏見，與美、臺兩地缺乏學術史（intellectual history）的瞭解，以及欠缺一套充足的政治發展理論（a theory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有關。⁹⁸

在這裡，墨子刻提到他在 1982 年 5 月間，發表於臺灣《中央日報》及

⁹⁶ Ramon H. Myers, "Reply", *Publican China*, vol.9, no.1 (October 1983): 29-35.

⁹⁷ Ramon H. Myers, "Reply", *Publican China*, vol.9, no.1 (October 1983): 35-36.

⁹⁸ Thomas A. Metzger, "Reply", *Publican China*, vol.9, no.1 (October 1983): 37-38.



《中國時報》中的幾篇文章。⁹⁹從這些文章中，我們可以瞭解，墨子刻所謂的「充足的」政治發展理論，是指「應該把某一國家在政治民主過程中，所遭遇到的障礙列入考慮，以便決定什麼是某一獨特國家合理的發展速度」；因此，他主張臺灣的民主化運動應該是「漸進的」，不能要求立刻實現民主化，同樣也不能將當時國民黨政權迫害政治上的異議者視為侵犯人權，這是兩碼子事。¹⁰⁰

在八〇年代初臺灣的民主化運動中，由於知識份子欠缺一種政治發展的清晰理論，而且經常作出一些非理性的、「烏托邦式」的政治評論，因此對中華民國有不公正的批評。當然，這並不是說墨子刻反對知識份子提出「烏托邦式」的政治評論（這是不可避免的），而是主張「在實際與烏托邦之間，在保守與急進的看法之間，如何找到中庸之道，如何作到合理的評估」。遺憾的是，中國知識份子向來缺乏西方自亞里斯多德以來所發展出的保守主義，來制衡此一「烏托邦式」的色彩，以致在近現代的中國知識份子中，有走向「不平衡的、烏托邦式的政治批評的趨勢」。以殷海光為例，「他強調『有什麼就說什麼』的態度，政府有錯失他當然『說什麼』，但是對政府的進步卻『不說什麼』」。¹⁰¹

美國的知識份子，由於受到1949年前少數關於中國共產黨的報導（如斯諾）、少數美國學者對儒家思想（中華民國基本的理念）的憎惡、西方人的「馬可波羅情結」（對中國大陸的迷戀）、某些美國政治家重國家利益的地緣政治觀點、知識份子反資本主義的烏托邦論調等因素，同樣促成

⁹⁹ 墨子刻，〈為什麼美國對中華民國有偏見？〉，《中央日報》，民國72年5月14日；墨子刻，〈再論政治批判的風格—答張忠棟、康勤、廖仁義諸先生〉，《中國時報》，民國72年5月20～23日。

¹⁰⁰ 墨子刻，〈為什麼美國對中華民國有偏見？〉，《中央日報》，民國72年5月14日。

¹⁰¹ 墨子刻，〈再論政治批判的風格—答張忠棟、康勤、廖仁義諸先生〉，《中國時報》，民國72年5月20～23日。

「親毛」、「反中華民國」的偏見。¹⁰²

儘管墨子刻由於其論點而被部分臺灣學者譏諷為國民黨政權的「御用文人」、「保守派」，但他仍堅稱他的論點是客觀的，而〈漢學的陰影〉一文的優點便在於它能避免「反中華民國」的偏見。此外，針對傅禮門把他等同於麥卡錫主義，以及傅氏採用部分臺灣極端異議份子的說法，認為臺灣人被恐懼與混亂麻痺的論點，他認為是沒意義的。¹⁰³

針對他在《擺脫困境》一書所提出對毛主義的讚美之詞，墨子刻則辯稱：¹⁰⁴

說我認為毛澤東的革命是一個「成功的故事」是斷章取義的，我是遵循「是甚麼就說甚麼」的精神來討論毛澤東。談到毛澤東思想及其所引導的各種運動的龐大動員力量，想必現在的學者專家多半還會接受我的看法。不過，我也犯了一項錯誤，即認定這些動員活動導致令人印象深刻的經濟成長—並不因暴動措施而有所破壞。這個錯誤的形成，主要是因我在撰寫該書之時（1976），有關這方面的問題必須依靠當時美國學者們的著作，因為我自己並不研究中共的經濟與政治發展。該書出版不久，美國學者們陸續提出一些新資料。1978年7月30日，我在The San Diego Union上發表一篇論文說到：「中共的『古拉格』群島（The Gulag Archipelago）¹⁰⁵與蘇聯唯一不同之處是缺少一位索忍尼辛（Aleksandr Isaevish Solzhenitsyn）將其情形向全世界宣告。」

也就是說，他確曾犯有錯誤（即忽略了中共的暴政），但這是資料局

¹⁰² Thomas A. Metzger, "Reply", *Publican China*, vol.9, no.1 (October 1983): 38.

¹⁰³ Thomas A. Metzger, "Reply", *Publican China*, vol.9, no.1 (October 1983): 39, 40.

¹⁰⁴ 墨子刻，〈再論政治批評的風格—答張忠棟、康勤、廖仁義諸先生（四之一）〉，《中國時報》，民國72年5月20日。

¹⁰⁵ 《古拉格群島》是索忍尼辛利用勞動集中營囚犯的資料所寫出揭露聯共專制統治的著作。該書於1970年代初於西方出版，在西方知識份子間「掀起軒然大波」。部分歐洲「左」翼知識份子甚至受此書影響，「掉轉矛頭，成為反共力量」。參閱：黃燦然，〈索忍尼辛的流亡與歸國〉，《聯合文學》第13卷第4期（民國86年2月），頁29。



限所難免出現的錯誤，且他已有所修正。反觀傅禮門，墨子刻則譏諷說，他還在稱讚「平等與反官僚的目的，在1949年後的中國，仍在持續向前發展著」。¹⁰⁶

此外，關於學者的論述與國家政策制定的關係，墨子刻認為學者的論述必然影響到公眾輿論，並因此進一步限制了政策的制定；針對柯保安所謂革命典範在近年來已日趨沒落的說法，墨子刻並不贊成，先前麥斯特與傅禮門對〈漢學的陰影〉一文的評論，不就是革命典範最好的例子？¹⁰⁷

最後，墨子刻辯稱，他們從沒試圖提出一個「決定論式」的與「目的論式」的歷史觀點（如傅禮門的批評），相反的，這是他們所要反對的。或許，正是由於〈漢學的陰影〉一文指出美國學者中這類方法論的返祖現象（即回歸到黑格爾主義），因此，該文才會受到如此憤怒的批評；也正是因為〈漢學的陰影〉一文的論點使得許多著名學者感到難堪，因此，對它的讚美也只能是私下的，而較少公開的讚美。¹⁰⁸

五、結論

事實上，馬、墨二人並非1980年代初對過去美國的中國研究進行批判的唯一學者，正如傅禮門在其評論中所言，「近來有不少對中國研究進行咒罵式的評論」。¹⁰⁹何以美國的中國研究圈在1980年代初會出現此一「咒罵」風潮？或許正如何漢理教授所言，所以出現此一現象，與當時美國學術和政治氣氛、中國在美國外交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西方人參觀中

¹⁰⁶ Thomas A. Metzger, "Reply", *Publican China*, vol.9, no.1 (October 1983): 41.

¹⁰⁷ Thomas A. Metzger, "Reply", *Publican China*, vol.9, no.1 (October 1983): 42-43.

¹⁰⁸ Thomas A. Metzger, "Reply", *Publican China*, vol.9, no.1 (October 1983): 43.

¹⁰⁹ Edward Friedman, "Collegiality and China Study", *Publican China*, vol.9, no.1 (October 1983): 21.



國後對中國印象的轉變等因素不無關聯。¹¹⁰而其中恐怕要以後者的影響最為重大。

隨著中美關係正常化開展以來，兩國學術交流愈加頻繁，更多的美國學者及記者獲准長期在華進行探訪研究。然而，這些學者、記者參觀中國的經驗，無不使他們感到挫折。一方面，中國官方常以「不方便」為由，拒絕向美國學者開放檔案資料；美國學者要求到中國農村進行田野調查，也被視為「嚴重滲透」，難以作出安排。¹¹¹毛思迪（Steven Mosher）事件的爆發，正突顯中美學術交流的困難性。¹¹²

另一方面，儘管中國官方多方面的限制，仍有不少的資料經由各種管道流出中國。新資料的獲得，往往對過去的研究典範起了極大的殺傷作用。特別是過去美國學者關於中國共產革命史的理論，由於資料的缺乏，往往顯得空泛，經不起新資料的考驗。正如史華慈所言：「往往一個簡單的事實就能殺死一套理論。」¹¹³在 1980 年前後，由當時美國駐華記者所傳回的

¹¹⁰ Harry Harding, "From China, with Disdain: New Trends in the Study of China", *Asian Survey*, vol.22, no.10 (October 1982): 944-945.

¹¹¹ Harry Harding, *A Fragile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 1972*, pp.125-126.

¹¹² 毛思迪當時是史丹佛大學人類學博士班研究生，1979~1980年間在廣東農村作田野調查。當時中國政府指毛思迪以各種不正當的手段獲得資料及從事田野調查（如賄賂地方官員、攜帶未受准許的資料出境、以及前往未開放給外國人參觀的地方），因此將其拘留，並要求史丹佛大學懲罰毛思迪，否則將斷絕學術交流。關於此一事件的真實情形，仍眾說紛紜。不過，史丹佛大學最後仍是決定取消毛思迪的博士生資格，不少美國國內人士以為史丹佛大學是迫於中國方面斷絕學術交流威脅的緣故，大肆抨擊，成為1980年代初轟動一時的學術爭論。至於毛思迪，他在1983年出版了*Broken Earth: The Rural Chinese* (New York: Free Press, 1983)一書，批評中國的生育計劃的野蠻，如強迫懷孕八個月的婦女墮胎，以及該計劃所促成的溺殺女嬰風氣。毛思迪日後也成為頗受臺灣歡迎的「中國報導」學者之一。Richard Madsen, *China and the American Dream*, pp.153-154; Harry Harding, *A Fragile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 1972*, pp.126-127.

¹¹³ Benjamin I. Schwartz, *China and other Matters* (Cambridge, Mass.; London: Harvard



中國相關報導，赤裸裸的暴露了中國社會的黑暗面，徹底顛覆了70年代美國人對中國烏托邦的幻想，同時亦使得「革命典範」無以自容。這些中國報導當中(其作者多是毛思迪的同情者)，以《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記者包德甫(Fox Butterfield)的著作《苦海餘生》(China: Alive in the Bitter Sea)¹¹⁴與時代雜誌(Times)駐北平特派員白禮博(Richard Bernstein)的《來自地心》(From the Center of the Earth)¹¹⁵最為著名。這兩本書日後皆被翻譯成中文，是1980年代初在臺灣被廣為流傳的中國報導書籍。¹¹⁶

部分中國研究學者在這些「新發現」的震撼下，不僅對過去的「典範」口誅筆伐(如〈漢學的陰影〉)，甚至不惜以「今日之我反昨日之我」(如墨子刻對其著作《擺脫困境》一書的批評)。他們有的試圖以新的典範取代舊的典範，儘管他們所建立的新典範終將為明日更新的典範所取而代之。正如何漢理在一篇名為〈帶著失望從中國歸來〉(“From China, with Disdain: New Trends in the Study of China”)的文章中所言：「我們以今日的『事實』(truth)取代昨日的神話，卻發現今日的『真實』(reality)變成明日的假像。」¹¹⁷

當然，我們既不可能(事實上也沒必要)針對此一爭論作出孰是孰非的判

University Press, 1996), p.5.

¹¹⁴ Fox Butterfield, *China: Alive in the Bitter Sea* (New York: Times Book, 1982).

¹¹⁵ Richard Bernstein, *From the Center of the Earth* (Boston: Little, Brown, 1982).

¹¹⁶ Richard Madsen, *China and the American Dream*, pp.156-158. 包德甫曾在哈佛大學大學研究中國史(啟蒙老師為費正清)，並曾來臺在臺灣大學學習中文，兼任紐約時報在臺特約記者；越戰時曾前往西貢採訪，後作過駐日本、香港的特派記者。他的著作在美國引起極大的反響，據說費正清曾評論：「這本書是美國瞭解中國的里程碑。」包德甫也不諱言的說：「我和理查(《來自地心》的作者)的書，都對中共提出另一種截然不同的看法，不同於稍早一些美國學者與記者對中共一面倒的浪漫看法。」參閱：殷允芃，〈包德甫談「苦海餘生」〉，《天下雜誌》16期(民國71年9月)，頁96-100。

¹¹⁷ Harry Harding, “From China, with Disdain: New Trends in the Study of China”, *Asian Survey*, vol.22, no.10 (October 1982): 934.



決。在這裡，筆者所要說的是，學術研究很難不受到外在環境的影響。眾所皆知，臺灣過去關於中國共產革命史的研究，便遭到統治者所灌輸的反共教條的嚴格限制，以至不少學者迄今尚未能完全擺脫「共匪」等先入為主的負面形象。而從上面的論述中，我們也可以發現，即使是被臺灣學者視為經典的美國學者著作，也很難不受外在環境的影響。從 1950 年代的「極權主義典範」，到 60 年代的「自由中派」著作，以至於 70 年代的「革命典範」，在在反映著外在環境與學術的互動關係，沒有一個學者能夠對外環境的影響完全免疫。80 年代初的大轉變，也不是近 20 年來美國的中國研究圈中最後一次的轉變。例如，在 1989 年天安門事件後，許多 70 年代「革命典範」的支持者（如傅禮門教授），反倒成了美國學術界中批判中共政權最力的主流派之一；¹¹⁸不少美國史家視中國共產革命為「歷史的脫軌」（historical aberration），並掀起了一股大陸時期國民黨史的「翻案風」。¹¹⁹由此看來，歷史研究的真諦，似乎並不在於給定一個最終的答案，而在於尋求答案的過程。

中英文人名譯名對照表

毛思迪	Steven Mosher	泰勒	George Taylor
片崗鐵哉	Tetsuya Kataoka	索忍尼辛	Aleksandr Isaevish Solzhenitsyn
白修德	Theodore White	麥卡錫	McCarthy
白魯恂	Lucian W. Pye	麥克法夸爾	Roderick MacFarquhar
白禮博	Richard Bernstein	麥斯特	Herman Mast
包德甫	Fox Butterfield	麥斯納	Maurice Meisner

¹¹⁸ 袁易（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傅禮門—柯林頓政府的中國問題智囊〉，《美國月刊》第9卷第3期（民國83年3月），頁124-125。

¹¹⁹ Arif Dirlik, "Reversals, Ironies, Hegemonies", *Modern China*, vol22. no.3 (July 1996): 250-251.



史汀區康	Arthur Stinchcombe	張灝	Hao Chang
史華慈	Benjamin I. Schwartz	郭岱君	Tai-Chün Kuo
伊斯雷爾	John Israel	傅禮門	Edward Friedman
伊懋可	Mark Elvin	斯諾	Edgar Snow
伊羅生	Harrold R. Issacs	畢仰高	Lucian Bianco
艾愷	Guy S. Alitto	費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
安德斯	Stephen Andors	費佛	Richard M. Pfeffer
李文森	Joseph R. Levenson	費維愷	Albert Feuerwerker
何漢理	Harry Harding	賈安娜	Annalee Jacoby
余爾日尼克	Philip Selznick	趙文詞	Richard Madsen
利皮特	Victor Lippit	塞爾	Charles Cell
里斯金	Carl Riskin	塞爾登	Mark Selden
所羅門	Richard H. Solomon	詹隼	Chalmers Johnson
林毓生	Yu-sheng Lin	德里克	Arif Dirlik
周錫瑞	Joseph A. Esherick	魯道夫	Lloyd I. Rudolph
易勞逸	Lloyd E. Eastman	墨子刻	Thomas A. Metzger
柯保安	Paul Cohen	墨菲	Rhoads Murphey
珀金斯	Dwight Perkins	賴斯	Simon Leys
馬若孟	Ramon H. Myers	霍夫海因茨	Roy Hofheinz
施拉姆	Stuart Schram	鮑大可	Doak Barnett
施堅雅	G. William Skinner	魏特夫	Karl August Wittfogel
格申克龍	Alexander Gershenkron	羅斯托	W. W. Rostow

